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一维两调

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布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永昌一带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部族众多，分布很广，很早就活动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濮人中的一支很可能就是现今布朗族的先民。自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唐（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县，濮人活动的地区就纳入了西汉王朝的郡县范围。在西晋时，永昌濮人中的一部分向南迁移到镇康、凤庆、临沧一带。唐朝时称为朴子蛮，元、明、清时称为蒲蛮。隋唐以后，文献记载有所谓濮人、朴子、朴子、朴子、朴子、蒲满、蒲人等名称，其分布更为广阔，唐宋时期，朴人受南诏、大理政权统治，以蒲人头人充任土知府。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

朴人受南诏、大理政权统治，以蒲人头人充任土知府。后来原居于云

杨民康

学院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杨民康 著

一 维 两 阈

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ISBN 978-7-81096-469-2



9 787810 9646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维两阈: 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著.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81096 - 469 - 2

I. ①一… II. ①杨… III. ①布朗族—民族音乐研究
IV. ①J607. 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0360 号

一维两阈 —— 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杨民康著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A5 印张: 12. 125 16 面彩插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96 - 469 - 2

定 价: 45.00 元 (附 CD 1 张)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序

最近民康又完成一部新作，是有关布朗族音乐研究的专著。民康对我说，田老师，您可得为我这本书写序。我也觉得是应该写。

为什么应该为这本书写序？为什么我也觉得应该写？有什么奥妙？说起来话长。

一

先要说说我和布朗族音乐的缘分。

记得是1972年第一次去云南西双版纳和思茅采风。工作计划的重点是了解和收集当地的傣族、佤族人、佤族的民间音乐。但就在版纳州首府景洪的广播电台，听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民间音乐，音调悠扬、轻柔、抒情，清脆的琴声伴随着歌声，好似山间流淌的淙淙清泉。原来这是布朗族的情歌——“索”。虽然很想去布朗山寨直接采访这些美好的音乐，但由于时间限制，未能如愿，只能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版纳，把愿望留给未来。

1978年，当我和袁炳昌再次去西双版纳，布朗族的音乐已是我们计划中考察的重点之一。勐海县沿国境线布朗族聚居的地方，西定、巴达、打洛的许多布朗族山寨，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个晚上，村寨的男女老幼都会集中在我们进行采录工作的竹楼里，静静地聆听本村的歌手们一个一个地为我们演唱各种民

歌，等到结束当天的采录工作后，我们就会把当天的录音从头回放一次。这时，村民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议论着，惊讶地询问着，这个小小的黑色盒子怎么把我们村里人的声音都收进去了？要知道，当时不但是边境山村的居民，甚至当地城镇的许多居民也还没有见过录音机。

这样，我们每天的采录工作都像是在山村举办了一次民间音乐的采集和展示的音乐会。我们和村民都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这次采风之后，我和袁炳昌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了两篇音乐散文，用朗诵和民间音乐录音相配合，向全国播放，介绍了云南南部边境几种少数民族的音乐。其中就有我们采录的布朗族音乐。其后我们又在《人民音乐》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布朗族音乐。据我所知，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核心刊物介绍布朗族音乐，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二

接着说说民康和布朗族音乐以及我本人的缘分。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民康在中央民族学院作曲专业学习时，我们已有师生之谊。80 年代中期，我调中央音乐学院后，1985 年音乐研究所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由我负责筹划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研究生的招生工作。民康是第一位前来报考的学生。没有想到他呈交的报名论文就是在勐海县打洛采访布朗族音乐后的调查报告。原来民康 1982 年结束在中央民族大学作曲学业后，在进行专业音乐创作的同时，也参加了云南民歌集成的工作，其间曾前往西双版纳地区采集布朗族音乐，并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工作。先后在布朗族山寨的采风活动是我们的共同经历，见到民

康的调查报告倍感亲切。

音乐学系考生的全部报名材料集中由系里审核，一天，路遇系主任蓝玉崧先生，他对我说，这次考生交来的论文中，云南考生杨民康的论文最好，条理清晰，有内容。

民康和布朗族音乐的缘分没有到此为止。他 1986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硕士论文的选题仍是对布朗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在音院学习的两年是民康一生事业中，用扎实与刻苦完成由作曲专业向音乐学专业转型的重要阶段。作为他的硕士生导师，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短短两年期间里取得的学术进展。在此期间，他为了更好地撰写学位论文，再次前往布朗族地区进行了范围更为广泛、程度更为深入的田野工作。1988 年，民康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不论从内容的全面、丰富和理论修养的成熟程度，都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

三

时间过去了 20 多年，经过进一步的学业深造与实践积累，民康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音乐学者。当民康拿来他的新稿《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时，我回想起民康 1986 年完成的《云南勐海县打洛布朗族民歌概析》^① 和 1988 年完成的硕士论文，觉得前两次应该他对于布朗族音乐所做的阶段性成果，而这次应该是布朗族音乐研究的第三部曲，是一个结论性的学术总结了。

事实就是如此，这部文稿不但是作者对布朗族音乐文化、音乐生活全面的梳理、分析，而且具体体现了民康多年来形成的学

^① 杨民康：《云南勐海县打洛布朗族民歌概析》，昆明：《民族音乐》，1986 年第 5 期。

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我们从文稿的上篇“布朗族音乐文化志”和下篇“阐释性结构分析”的章节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方面的内容。深信同行们会从本书吸取不少有益的养分。

民康今年录取了国内第一位布朗族的音乐学专业博士生，现在又完成了布朗族音乐研究的专著，我为民康的“布朗族情结”转化出来的教育与学术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用这篇简短的序言表示祝贺。

田联韬

2011年12月于中央音乐学院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上篇：布朗音乐文化志

一、人文与自然生态环境	(8)
(一) 民族文化概况	(8)
(二) 民族历史沿革	(12)
(三) 自然环境与音乐文化	(18)
(四) 经济环境与音乐文化	(19)
(五) 社会环境与音乐文化	(20)
(六) 宗教环境与音乐文化	(22)
(七) 语言文字与音乐文化	(28)
二、音乐与历史文化背景	(31)
(一) 消逝在“南方丝路”上的乐舞王国	(31)
(二) 初级农耕社会的音乐文化遗存	(34)
(三) 佛教文化及领主政治产生的影响	(40)
(四) 与汉族音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	(43)
(五) 1949 年以来的布朗族音乐文化	(46)
三、人生仪礼及过渡阶段的一维两阈架构	(51)
(一) 社会个体及其人生阶段特征	(51)
(二) 人生仪礼含有的共性因素	(53)

(三) 人生仪礼含有的个性因素	(54)
(四) 布朗族音乐的“一维两阈”架构	(57)
(五) 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	(66)
四、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	(69)
(一) 诞生礼歌、儿歌与催眠歌	(69)
(二) 成年礼歌与情歌、情曲	(95)
(三) 婚礼与婚礼歌	(117)
(四) 丧礼与丧葬歌	(124)
(五) 祭礼与祭祀歌	(126)
五、村社与宗教节庆音乐活动	(129)
(一) 核心层——早晚课诵仪式	(130)
(二) 中介—外围层 (一) ——安居节仪式	(131)
(三) 中介—外围层 (二) ——泼水节仪式	(156)
(四) 中介—外围层 (三) ——自然宗教仪式	(161)
(五) 外围层——传统风俗歌	(163)

下篇：阐释性结构分析

六、系统、结构与功能	(168)
(一) 布朗族音乐与社会系统	(168)
(二) 乐舞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185)
(三) 传统音乐的整体化功能	(197)
(四) 结语：“结构”、“解构”与“重构”	(205)
七、分类、形态与风格	(207)
(一) 传统音乐的分类与分类观	(207)
(二) 音乐活动与音声的共聚及其表层结构	(216)

(三) 原型模式——模式变体及其深层结构	(236)
(四) 民歌旋律的点、线结构及发展衍变关系	(248)
(五) 节奏、节拍的有序性发展及其内外诱因	(261)
(六) 乐器、法器和器乐曲	(268)
(七) 布朗族传统音乐文化风格区的形成与分布	(280)
(八) 结 语	(285)
八、观念、术语与行为	(291)
(一) 民间音乐分类的价值观	(292)
(二) 从音乐用语看音乐的流变	(296)
(三) “社会一个体”仪式与歌(诵)唱行为	(301)
九、传承、变迁与现状	(307)
(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布朗民歌的变迁轨迹	(307)
(二) 民歌文化的当下状况与生态格局	(315)
(三) 民歌文化传承的现实状况	(324)
(四) 当前存在问题和矛盾的初步分析	(326)
结 语	(333)
参考文献	(335)
附录一：名词索引	(339)
附录二：谱例索引	(356)
附录三：图表索引	(359)
附录四：照片索引	(361)
附录五：布朗族民歌分布数据表	(364)
附录六：布朗族音乐志光盘曲目	(370)
后 记	(372)

绪 论

在今天的中国学界，人们提起布朗族，也许会联想到：首先，它承续着来自云南与东南亚孟高棉人的共同祖先——濮人的悠久历史；继而，它与云南的傣、德昂、佤等民族及许多东南亚民族共同享有南传佛教的文化传统；再者，它同傣、哈尼（僮尼人）、基诺、佤、彝、拉祜等民族共居于西双版纳、双江等地，共同拥有一种以多民族聚居一杂居为特色的区域民族文化。可以说，人们对于这个世居深山的族群及其文化领域的知识，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认知程度。然而，以我个人二十年余来的学习经历来看，局外学人能对之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深度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从远而近、由浅入深的体验过程。

根据不同时期对布朗族的考察体验，我对布朗族音乐的认识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过程。第一个阶段始自 1983 年，当我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歌舞团的一名创作人员，第一次来到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地区，一听到布朗族民歌中的几首新【索】，立即便为其自然独特的风格、清新优美的旋律和别具一格的表演形式所折服。此后几年里，我写的一些音乐作品，几篇理论文章，乃至后来紧接着的考研和写硕士论文，都被这个命题一线所牵。当时我在西双版纳所听到的其他民族的音乐，似乎都统统让位于它。可见，这一时期我的思维观念仍然是以艺术和审美为准绳，以感性认识为先导。这在我四十年来从崇尚艺术表现逐步走向追求学术创新的事业生涯中，乃居于某种转型和过渡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 1986 至 1988 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期间，通

过两次远赴西双版纳山地丛林考察，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在这篇论文里，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在对布朗族音乐文化的描写上，已经从当初比较纯粹的艺术性思维里走了出来，转而开始去关注历史、社会、经济、宗教等人文环境及自然环境对传统音乐的控制和影响。其中突显了民族学、语言学及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社会科学思维，在写作上少了一点感性的流溢，多了一些理性的思绪，显然受到了当时北京学术界及中央音乐学院极其浓厚的社会科学学术氛围的熏染。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学术尚未完全走出“文革”思维的阴影，该论文对于南传佛教文化作为“全民信仰”，对傣族、布朗族音乐文化所起的深刻影响尚未能够有充分的认识和相应的描写。第三个阶段则是自1996年以来，我开始了对傣族南传佛教音乐进行的长达10余年的跟踪考察。尤其是1999年至200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较系统地接受民族音乐学学术训练之后，使我对南传佛教在傣族、布朗族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的核心地位和所起到的重要文化控制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此后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及其他论文里，便开始企望对包括布朗族在内的西双版纳地区的地域性及民族性音乐文化生态进行整体的思考和把握。

随着研究过程的逐步展开及认识的由表及里，我所采用的方法论也体现出如下三个由浅入深的阶段性过程：

其一，聚焦于对象物本身的静态研究。一项人文社科性质的课题研究，通常要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者及其互动关系。在研究对象一方，又可再分为行为主体——音乐文化持有者与对象物——音乐现象以及相关音乐文化背景三个方面。所谓聚焦于对象物本身的静态研究，即仅以音乐现象这唯一要素为意向中心，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方法。由此看来，在我的上述布朗音乐研究的第一阶段（1983～1986），由于受到当时

在民间音乐研究领域尚占有统治地位的音乐型态学观念的影响，音乐形态分析在其中几乎成为唯一的分析手段，即带有该类研究方法的典型特征。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由于这类方法只涉及了课题的表层现象和静态分析，尚缺少整体、系统的眼光和必要的问题意识，在整个以布朗族传统音乐为对象的研究课题中，乃处于较为片面、孤立的初期研究阶段。

其二，聚焦于对象系统的动态——静态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的布朗音乐研究进入第二阶段（1986～1996）。此时正是系统论、符号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盛行，以及梅里安姆（A. Merriam）、胡德（M. Hood）等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所倡导的整体论、功能论方法传入之际，受上述方法论思维的影响，在我的研究观念里，认为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布朗族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在这个地域性文化生态群落的整体考察中据有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必须去深入地考察和研究文化生态群落对于传统音乐的生存发展起到的某种“语境”作用。此外，也力图从系统论、符号学的角度，对于研究对象之一——音乐文化主体——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给予了一定的顾及。可以说，这种研究观念已经走出仅考察单一对象物的较片面做法，已经属于一种聚焦于对象的整体系统，交叉运用动态——静态的不同分析手段的另一层次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当整个田野考察及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二者之间产生着频繁互动，并对研究过程及其结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时，整个课题研究仍然以研究对象为意向中心，而对上述互动过程及其影响后果忽略不计，以致在学术结论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偏颇之处。

其三，强调“局内—局外”互动关系及“换位思考”的动态研究。在第三个研究阶段（1996～），随着对傣族及布朗、德昂、佤等孟高棉语族群传统音乐的田野考察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以往研究中所未能注意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通过

长期以来与不同族群研究对象的频繁交往互动，我开始认识到：在从事音乐民族志研究时，作为研究者，有必要兼从音乐文化持有者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考察人与物象、事象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应该走出仅聚焦于研究对象的误区。应该承认布朗族民歌在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同时，也带有“音乐作为语言”（能指），而非简单地作为（所指）对象或文化产品的特殊功能意义。此外，还应该兼顾“局外人——局内人”及“客位——主位”的不同角度，重视采用“换位思考”以及对“内文化持有者”自身观念进行阐释等方法，致力于考察和研究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类强调“研究者在场”及重视研究者自身体验过程的研究，尤其显现出由传统民族志向现代实验音乐民族志转型期间的思维趋向及学术特色。

为了达到以上研究目的，本书着重从下述两对关系入手，以展开动态的音乐民族志考察研究：

首先，于研究对象的层面，本书注重从较为宏观的社会学及社会关系角度，提出进一步考察布朗族音乐与“历史、社会、个体”三维关系之间有何联系及在其中起到何种社会作用这个总体任务。一方面从仪式学研究的角度入手，从“社会群体”一端，将布朗族传统音乐置入“信仰体系、仪式与仪式音乐”这一学术语境中，考察在该学术语境及相关的村落社会和群体文化规范的控制之下，布朗族传统音乐作为“核心—中介—外围”音乐文化丛系统，呈现出什么样的活动状态和具有何种文化功能作用。另一方面，从“社会个体”一端及人生仪礼和个人行为角度入手，考察在上述文化语境及社会系统中，作为布朗族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在自己的一生（各个人生仪礼及过渡阶段）中是如何去适应相关的社会规范？是怎样根据这些社会规范来调适自己的音乐生活和文化行为的。可以看到，行为主体——音乐文化持有者与对象物——音乐事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乃是本书的一

个观察和研究重点。

其次，为了弥补和修正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的多种学术偏向，笔者希望在本书中采纳一种兼具“局内—局外”、“客位—主位”的眼光和方法，尤其重视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去进行文化阐释以及在“主位—客位”两者之间换位思考的研究思路。为此，本书继提出了由于全民信仰南传佛教的原因，在布朗族、傣族传统音声文化产品中存在着包含核心、中介、外围三个层次的音乐文化丛现象这个问题（参见第六章）的同时，还集中阐述了其与布朗族民间音乐分类观念之间的关系（第八章）。并且认为前者乃是一种笔者基于外来研究者持有的局外人、客位的学术眼光和文化立场，意图对于布朗人音乐文化进行精微、细致的系统分析和描写的结果；后者则是本人通过对布朗人音乐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和体验之后，对布朗人包括音乐分类观在内的自身文化观念进行阐释性解读的一个尝试之举。可以认为，在今天的学术立场和观念基础上，若能够将上述两种分别反映了“局内—局外”“客位—主位”“他者—我者”等相对立场的观念认识加以对照互补，或能够产生一种具备“换位思考”学术特点的、有益于揭示更多学术真谛的研究结果。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在第一到第五部分里，首先借助于音乐文化志的思维和书写方式，从“一维两阈”结构之“隐身阈”入手，渐次进入“社会阈”，意在借鉴仪式人类学之“结构与反结构”的思维方法及分析手段，对布朗族传统音乐各个子系统分别予以描述和介绍。从第六章开始，又从结构与功能、形态与风格、观念与行为以及传承与变迁等不同的角度，以系统性、整合性为目的，再对之进行一番阐释性结构分析。所获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一方面，在一种长期持续至今的传统社会景观中，“社会阈”主要涉及以佛教音乐为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相对久远的“核心—中介—外围”音乐文化丛，其中，一种可称之为

“超稳定结构”的文化要素通过“负载功能”或再现性功能凸现出来；另一方面，人生仪礼民歌隶属于“隐身阈”及“核心—中介—外围”结构中的外围层次，其自身文化的变异性、对异文化的接纳性以及活动状态的不停歇性等社会性因素的交互作用，致使这类音乐文化的创作经常处于某种具短暂性、颠覆性的“未完成”状态。它们以自己非理性、动态性和“对话”般的姿态面目“不断干扰和重组符号的运作”^①，由此而引发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布朗族地区发生的种种传统音乐文化的“重组”、“重构”现象。对此，本书第七至九章一一予以了交待。

若按照以往的做法：人们要么持早期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观念，注重宏观层次的比较音乐研究；要么遵循传统民族音乐学的立场，仅注重微观文化（群体）个案的课题研究；或者立足由微观到宏观，由注重地域性研究课题或微观群体个案到注重跨地域性——跨文化群体比较研究。由于人们的眼光都聚集到社会群体乃至更大范围的话题上面，有关群体内部的个体生命及其文化生存状况的考察便因此而遭遇缺失。它一定程度体现了以往的学术研究顾此失彼，徬徨无措，未能走出旧的方法框臼的现状和困境。笔者注意到，一种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即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维克多·特纳（Victor Durner）等人把社会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和“分化—阈限—再整合”的过程，并利用其中“结构与反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来展开族群文化与仪式研究。^②近年来，有关“国家在场与日常生活”或“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本书所强调并使用的“一维两阈”研究方法，即是在受到上述研究观念

① 转引自王瑾：《互文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② 〔法〕维克托·W.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赞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